

文心雕龍選析

祖保泉



责任编辑：周荣显
封面题签：张建中
装帧设计：蒋万景

文心雕龙选析
祖保泉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260,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276·10 定价：2.65元

1764/28

目 次

传 记

梁书·刘勰传..... (1)

选 篇

序 志..... (16)

原 道..... (39)

宗 经..... (61)

辨 骚..... (81)

明 诗..... (103)

论 赋..... (121)

神 思..... (146)

体 性..... (165)

风 骨..... (179)

通 变..... (196)

定 势..... (214)

情 采..... (231)

熔 裁..... (244)

声 律..... (260)

章 句..... (281)

丽 辞..... (297)

比 兴.....	(315)
时 序.....	(333)
物 色.....	(364)
知 音.....	(382)
后 记.....	(400)

梁书·刘勰传

刘勰字彦和^①，东莞莒人^②。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③。父尚，越骑校尉^④。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⑤，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⑥。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⑦，勰所定也。

【注释】

- ①“刘勰”句——刘勰立字，完全符合“展名取同义”（《论衡·诂术篇》）的原则。《说文》曰：“勰，同思之和。”又，“彦，美士有文。”“勰”与“彦和”同义。
- ②“东莞”句——东莞（guǎn），郡名，晋太康元年置，治在莒（jǔ）（今山东省莒县）。永嘉丧乱，东莞郡沦陷。东晋明帝时，侨置南东莞郡于南徐州（今江苏六合、句容、镇江、无锡一带），镇京口（今镇江）。
- ③“祖灵真”二句——刘灵真，事迹不可考。宋司空秀之，即刘秀之，死后追封为“司空”。
- ④越骑校尉——武官名。一说“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因以为官名。
- ⑤僧祐（公元444——518年）——齐梁之际的高僧。《高僧传·

释僧祐传》：“本姓俞氏……永明中，敕入吴……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会身斋等。”

⑥经论——指佛教经典。佛教以经、律、论为三藏。经为佛之自说，如《法华经》、《涅槃经》等；论是经义的解释，如《唯识论》、《俱舍论》等；律记戒规，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

⑦定林寺——据《高僧传》、《建康实录》、《建康志》等书记载，有上定林寺、下定林寺。僧祐、刘勰曾住上定林寺。根据《高僧传》、《建康实录》等书编撰的《南朝佛寺志》“上定林寺”条说：“上定林寺，宋元嘉十二年高僧昙摩多移建也，在下寺西山上。”《高僧传·僧祐传》说：“祐卒，窆(biǎn)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基也”。据此可知，自齐以后下寺已废。定林下寺旧址在今明孝陵；上寺，宋齐时寺址在今明孝陵西山上。赵宋乾道间，别建上定林寺于今南京东南的方山（亦名天印山）。（参阅朱偁《金陵古迹图考》〔商务版〕第六章，《南朝四百八十寺》一节）。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①。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②。出为太末令^③，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④，兼东宫通事舍人^⑤。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⑥，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⑦，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⑧。诏付尚书议^⑨，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⑩，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注释】

①“天监”二句——天监初，指梁武帝天监元年或二年（公元502—503年）。奉朝请，六朝时安置闲散官员的头衔。《宋书·百

官志下》：“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奉朝会请召而已。”

②“中军”二句——中军，即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即临川静惠王萧宏，梁武帝之弟。记室，官名，掌文翰。车骑仓曹参军，官名，掌管车骑仓库之事。

③太末——今浙江龙游县。

④“除仁威”句——除，拜官授职。仁威南康王，梁武帝第四子萧绩的封号。

⑤东宫通事舍人——官名，在太子宫中掌管呈进文书之事。太子，指昭明太子萧统。

⑥“时七庙”二句——庙是奉祀祖先的地方。古代礼制，“天子七庙”。时，指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十月以后。《梁书·武帝纪（中）》：“（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脔，犹有脯修之类，……可更详定，悉荐时蔬。”

⑦二郊农社——二郊，指天子祭天于京城南郊、北郊的祭坛。农社，指天子祭谷神、土地神的祭坛。祭天、祭谷神，古代统称为“郊社之礼”。

⑧“纁乃表言”句——刘纁上表事，据史传推知，时在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八月以后。杨明照曰：“七庙飧荐改用蔬果，既始于天监十六年十月，则二郊农社之‘犹有牺牲’，其指次年正月、八月之祀乎？此可据史传推知者也。”又曰：“传文于七庙飧荐曰‘已用蔬果’，于二郊农社曰‘犹有牺牲’，以‘犹有’与‘已用’对文，则舍人陈表，为时当在天监十七年八月之后，此又可就史传推知者。”

⑨尚书——指尚书省，朝廷的政务机构。

⑩步兵校尉——武官名，东宫的显要官职。给刘纁这个头衔，表示提升。

初，纁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

而次之^①。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②

【注释】

①引而次之——引，引用前人之言。句意谓（对各种文体）引用前人之言，依次论述之。

②其序曰——序，即《序志篇》，详后。

既成，未为时流所称^①。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②。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③。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注释】

①“既成”二句——既成，指《文心雕龙》已撰写完成。时流，当时名流。称，称赏。

②沈约——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齐梁时著名文学家。《梁书·沈约传》说，沈约在齐和帝时，官至骠骑司马，迁梁台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贵盛。刘勰负书干约事，当在此时。

③货鬻——贩卖货物。

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①。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②。证功毕^③，遂启求出家，先爇鬓发以自誓^④。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⑤。文集行于世。

【注释】

- ①“京师”二句——刘勰所写的寺塔碑志，今仅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它如《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皆仅存名目。又《弘明集》载勰撰《灭惑论》一篇。
- ②“有敕”句——敕(chì)，皇帝的诏书。慧震，事迹不可考。
- ③证功——指刘勰编定佛经的功德。证，佛学术语。“无漏之正智，能契合于所缘之真理，谓之证。”
- ④“先爇”句——剃个和尚头，烧掉头发，表示出家的决心。
- ⑤期(jī)——一周年。

【附记】

刘勰传记今存两种，一是《梁书·刘勰传》，一是《南史·刘勰传》。后一种传记是前一种传记的节录，丢弃了一些史实。为探究刘勰的生平概况，我们选取了《梁书·刘勰传》。

《梁书·刘勰传》对传主的生、卒年代，未作明确的记载。今人说刘氏大约生于公元465年，卒于公元522年或公元532年。这都是根据本传再加上其它材料推算出来的。

说刘勰大约生于公元465年，重要的根据是《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关于成书年代问题，清代学者如纪昀、郝懿行、顾广圻等都异口同声地说“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而以刘毓崧的成书于齐末说最有说服力。刘毓崧在《通雅堂集·书〈文心雕龙〉后》一文中，据《时序》篇“皇齐取宝”至“文思光被”一段，指出：“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公元498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事，据皇齐取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他又根据刘勰负书于沈约于车前事，指明沈约在和帝时，官驃骑司马，迁梁台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贵盛。这就是说，《文心雕龙》成书必在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公元501至502年）四月以前。

刘毓崧的考证有理有据，是可信的。

现在，暂定成书于公元502年四月以前。据此推算，由动念头著书到写成《文心雕龙》五十篇，约三年或四年时间；而《序志》篇中说：“齿在逾立……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知他动念著书时，已三十出头，今暂定为三十三岁。根据动念头著作时的年纪、写书所需要的时间、成书年代三个数据向上推算，可知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即公元465年。

关于刘勰的卒年，范文澜根据本传“勰乃表言二郊宜与

七庙同改”事，按史实指明刘勰上表当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冬。又据“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数语，认为“撰经”当在僧祐卒后，而僧祐卒年为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撰经为时一、二年，毕功后遂启求出家，约在“普通元、二年间（即公元520—521年间）”，“未期而卒”，卒年当在公元521—522年间。①

近年，李庆甲同志根据《大藏经》中的《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和《续藏经》中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氏通鉴》等五部著作中关于刘勰出家为僧年限的记载，撰写了《刘勰卒年考》、《再谈刘勰的卒年问题》，断定刘勰在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以后出家。他的主要论据是：

《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名士刘勰者，雅为太子所重，……表求出家。”

《释氏通鉴》：“辛亥三年（即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统卒。丙辰二（即大同二年），刘勰表求出家。”

《佛祖统纪》：“（大同）三年，昭明太子统薨。……（大同）四年，通事舍人刘勰……是年表求出家。”

《佛祖历代通载》：“辛亥（中大通三年）。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刘勰……表求出家。”

《释氏稽古略》：“辛亥，中大通三年四月，太子统卒。丙辰，大同二年，梁通事舍人刘勰表求出家。”

李庆甲考证，这五部著作，以《隆兴佛教编年通论》成

书最早,它是上引其它四部著作的蓝本或重要参考;这五部著作有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刘勰出家于萧统死后。李又根据刘勰在天监末年担任官职的情况以及刘勰和萧统之间的关系,推断刘勰出家于萧统死后。并对《梁书·文学传》所列传主,以卒年先后为序,一一进行考证,从而证明刘勰大约卒于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②

我们认为,李庆甲同志的这一见解,既有一定的史料根据,又是合情合理的。它会越来越得到研究者们的肯定。

二

关于刘勰的籍贯,本传称:“东莞莒人”。这既指他是“南东莞莒人”,又表明他的祖籍为东莞莒县。可是近年有些学者竟简单地叙述道: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③

刘勰字彦和,山东莒人,曾寄居江苏镇江,……但他一心向学,追随着当时有名的和尚僧祐(《弘明集》的编者)有十多年,在莒县浮莱山的定林寺,协助僧祐整理藏经(《南史·刘勰传》说刘勰著有《定林寺经藏序录》)。④

这便告诉读者,刘勰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山东莒县。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1962年,曾有纪念刘勰诞生一千五百周年活动,在山东莒县的浮莱山定林寺建立了“文心亭”,并由郭沫若同志大书“文心亭”三字,勒石树碑。这样一来,好象刘勰撰写

《文心雕龙》的地点就在浮莱山定林寺。1980年一月，新华社新闻展览照片稿中有一帧“浮莱山定林寺”，其“说明”称：

“山东省莒县浮莱山定林寺，是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的故居。刘勰字彦和，住定林寺十多年，借寺内藏书，刻苦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写成《文心雕龙》五十篇。……”这就把“假戏”当作“真事”来看了，颇有澄清的必要。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南北朝时，有两个“东莞郡”，一个是北方的“东莞郡”，属青州；一个是“侨立”的“东莞郡”，属南徐州。《宋书·志二十五》记载：宋失淮北，侨立莒县、诸县、东莞，属东莞郡。侨立的东莞郡又称南东莞郡，属南徐州，而南徐州当时所辖之地，即今江苏六合、句容、镇江、无锡一带。据《宋书》记载，刘勰的曾祖辈已侨居“京口”（镇江），那么刘勰的诞生地以及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地点，亦当在京口和以京口为根据地的江南一带。

《梁书·刘勰传》说：“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是说，死后封司空的刘秀之是刘勰的叔祖父。

《宋书·刘秀之传》说：“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

又，《刘穆之传》说：“刘穆之，字道和，……东莞莒人。……世居京口。”这是说，刘穆之是刘勰的叔曾祖父。刘穆之、刘秀之皆“世居京口”，那么，如为《梁书·刘勰传》补一句“世居京口”，也是不错的。又，《刘穆之传》中说穆之曾自称“丹徒刘郎”，这个“丹徒”即“丹徒县。”京口在当时是个小镇，属丹徒县。穆之自称“丹徒刘郎”是举县名而自称，本传称他“世居京口”，乃是称其乡里，这两者恰相符合。

说刘勰青年时代生活在江南，也是有根据的。刘勰青年时代的大事件即本传所说的“依沙门僧祐”，而僧祐就在江南。《高僧传·释僧祐传》说：

释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苏宿迁县）人。父世居于建业（今南京）。……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祐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公元483——493）中，勅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伸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捨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

照这个传记说，僧祐在永明前，已成为有名的人物。他入吴讲经之时，正当刘勰二十有余之年。此时，僧祐需要文士为他“造立经藏，搜校卷轴”，而“笃志好学”的青年刘勰则因家贫需要找依靠，于是有了“依沙门僧祐”的事。

僧祐入吴后，修治钟山定林寺、建初寺等，这是史有明文。我们在上文“定林寺”条注释中已说明寺址。我们之所以不嫌饶舌地说明青年时期的刘勰生活在“京口”、“钟山定林寺”两地，目的在于使读《刘勰传》的人清楚地知道，刘勰一生生活在南朝。如果照有些人说的那样，青年时期的刘勰生活在山东浮莱山定林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刘勰成年后为什么由北魏投奔萧梁？应该指出，这是个没有任何根据可以答复的问题，因为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三

略谈对“颺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的看法。

有人说，刘颺“在早年就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佛教徒”，佛家思想促使他不婚娶，而去依居沙门僧祐。初看起来，这个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刘颺“长于佛理”，最终又“变服”为僧；但是这个说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它抹煞了刘颺“笃志好学”和胸怀“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宏伟志向。这里，让我们略加申述。

（一）刘颺“家贫”是个事实。他的祖父刘灵真毕生无事可称，史家对他不过提名而已；他父亲刘尚，也只是个“越骑校尉”的小官，而且死得又早。这就使青少年时期的刘颺自然陷于“家贫”的处境。如果再联系《刘穆之传》、《刘秀之传》，从刘穆之自称“家本贫贱，贍生多缺”，刘秀之“家贫，求为广陵郡丞”的叙述看，便可知刘家素来清贫。刘穆之是宋高祖刘裕的心腹，刘裕上表说穆之“爱自布衣，协佐义始”，就道出刘氏家族，本系寒素。再就刘颺写成《文心雕龙》后，自负其书于沈约于车前一事看，也证明刘颺出身寒微^③。

（二）刘颺“笃志好学”，是可以他的毕生行径来证明的。青少年时期的刘颺，由于“笃志好学”，有文才，才有条件依僧祐，协助僧祐做“造立经藏，搜校卷轴”的工作。在依僧祐时，他又撰写《文心雕龙》，更证明他此时既深研儒经，又旁通内典。当他接近爱好文学的昭明太子时，

正因为他能与之共研文学，所以才受到“深爱接之”的待遇。杨明照说：“选楼所选者，往往与《文心》之‘选文定篇’合；是《文选》一书，或亦受有舍人之影响也。”^⑥这一推测颇有道理。

（三）明确了以上两点，也许要问：是“笃志好学”促使刘勰依居僧祐，还是佛家思想促使他依居僧祐呢？我们认为，这两种思想刘勰当时兼而有之，但主导方面则是“笃志好学”的思想。出于“笃志好学”的愿望，他要求获得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这才去依居僧祐；而他所依靠的僧祐又是一个博学的高僧，这才能“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齐梁时，在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下，佛寺林立，僧侣众多，佛教的势力很大。佛寺拥有巨大财产，可以养活一批闲人；同时佛寺里藏书很多，可供好学之士研习。好学之士，为了免受外界干扰，往往躲到佛寺里去与高僧作伴，埋头读书。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如《宋书·周续之传》记载：“续之年十二，诣宁（范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又说他“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并为宋高祖的世子讲《礼》^⑦，这足以证明周续之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乃是为了潜心学习儒经。又如《宋书·雷次宗传》记载：“（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⑧这就更明确地道出雷次宗入庐山事沙门乃是为了排除世务干扰。又如《陈书·欧阳颍传》记载：“（欧阳颍）乃庐于麓山寺傍，专精习业，博通经史。”^⑨这更说明了欧阳颍行径的目的。比照这些事例，我们说青年时期的刘勰依居僧祐，主要是为了学习，为了能

有条件从事著述，而不是一心想成为僧人。试想，如果刘勰一心想成为僧人，为什么迟至死前一年才“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呢？

应该承认，刘勰处在佛教盛行时代，他在投依僧祐前以及依居僧祐之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事实。但支配他行动的主导思想乃是“笃志好学”，力求有“树德建言”的机会。他入梁后的主要生活经历，足以证明他依居僧祐的主要思想动机。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根据刘勰早年依居沙门僧祐的现象，便轻易地断定他早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们既不能抹杀佛教思想对青年刘勰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他的“笃志好学”、要求“树德建言”、“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生思想。

（四）刘勰为什么“不婚娶”？有人推测说是“因信佛而不婚娶”。这是只就刘勰主观思想而不顾及客观条件的说法。我们认为，本传说青年时期的刘勰因“家贫不婚娶”更为可信。纵观刘勰一生，大致可以说，二十多岁的才士刘勰，无父无母，家贫，而又无一官半职，自然没有婚娶的条件，又因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才没有婚娶；后来他依沙门僧祐，寄食佛寺，也谈不上婚娶；入仕梁朝后，他虽有“奉时”的机缘，作个太子侍臣，却没有“骋绩”的地位。宏志未展，何以家为？又因染佛日深，年岁渐老，不欲遗累于人，遂不婚娶，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持“因信佛而终身不娶”的论者说：刘勰入梁以后，所处境遇已经改观，如欲婚娶，犹未为晚；刘勰能四十余后而娶，而刘勰却行年四十仍不娶，就是因为信佛。我们以为这也是只看刘勰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不顾刘勰“树德建言”的抱